

从18岁到28岁（一）

——记万伯翱在黄泛区的十年岁月

■翟国胜

有这么一个人，出生于党的高级干部家庭，从小在中南海长大，然而，从18岁到28岁，他的青春岁月却是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度过的，在豫东平原的3500个日日夜夜，成了他一生中难忘的记忆。他就是万伯翱，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，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，第十二届、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国务院原副总理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大儿子。

1962年，万伯翱高中毕业，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。

那时，中国刚刚走出3年自然灾害的困境，处于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。国家精简城市人口，号召“大办农业”“大办粮食”，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，北京已经有一批中学毕业生被安置在近郊条件较好的国营农场。当时万里是北京市委副书记、副市长，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响应国家的号召，离开家庭，到基层去，到更远的地方去，了解劳动人民，了解社会，一切从头学起。

此时，年轻气盛的万伯翱因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心情郁闷，也想离开家到外面闯荡一下。

但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万伯翱心中并没有底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万里的一位老朋友潘复生来到了万里家。潘复生原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，1958年被错误地打成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，下放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担任副场长。1962年4月，中央批准为潘复生彻底平反，调任全国供销总社主任、党组书记。潘复生和万里是山东老乡，过去又长期在一起工作，所以潘复生到北京后就到万家聊天。当万里说出自己想让儿子下去劳动锻炼的想法时，潘复生非常赞成，提议让万伯翱去他劳动过的那个黄泛区农场。他俩一拍即合，把这事定了下来。

为此事，万里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家庭会议，七八十岁的老母亲也被请来参加。

万里在家庭会议上对万伯翱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也是你的父亲，我并不是不爱你，爱自己的孩子看怎么个爱法，是娇生惯养，把他放在暖房里头，还是让他到风雨中去锻炼、去吃苦？我决定送你到农业第一线，到很艰苦的农业第一线去锻炼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万伯翱感到有些突然。自己从小衣食无忧，猛然间要离开家，多少有些舍不得。而且，自己从未出过远门，却突然要去一个举目无亲的远地方，

独自一人能够适应农村艰苦的生活吗？父亲是不是“太无情”了？万伯翱思想斗争很激烈。最后，年少气盛的万伯翱下定了决心：去就去！

当时，家里人因为不舍，也曾表示反对，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万里的决定。万伯翱的奶奶心疼得哭了，流着泪对万里说：“那个地方冷不冷啊？要冷的话，你把皮大衣给他，别把他冻着了。”

万里笑着对万伯翱的奶奶说：“不用，一毛钱也不要给他，要让他自力更生。不过，这个月的伙食费可以带着。”沉吟一下，他又对万伯翱说：“钱是不能给的，但书可以给，想带多少？爸爸大力支持。”

在这次家庭会议上，万里郑重地向万伯翱提出这样一个要求：“不要总想着回来，若是你怕吃苦逃到海外去，可能我管不着；但若是你逃回这个家，我是不会让你进门的。”

临行前，万里又郑重地对万伯翱说：“我来自工农，你又回到工农。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，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‘加强农业战线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你去后要好好劳动，学习生产知识，钻研农业技术，对国家才有用，你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。有志气的青年，应该自力更生，不依靠父母。有人觉得

得参加农业劳动丢人、没有出息，所以轻视农业劳动，这是缺乏无产阶级觉悟的表现。我想叫你在北京掏大粪，这件艰苦的工作也适合你，我认为有这样一个儿子很光荣。但我觉得你更需要离开家，离开父母，到远些的地方去，一切从头学起，这样对锻炼你独立生活、独立工作的能力和顽强的意志更有利。”

最后，万里再三叮咛万伯翱说：“你不要想做官，你不能当队长，你就是去当个普通的农民、普通的工人。”

1962年9月6日，万伯翱怀揣着万里写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信，告别了家人，在一个公务员的陪同下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奔赴河南省黄泛区农场。

当时，万伯翱的行李非常简单：一床被子，一条毯子，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一个洗脸盆。除此之外，身上就只带了两本书和15元钱。这两本书是万里送给万伯翱的，一本是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，一本是苏联名著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万里在送给万伯翱的一个笔记本上题了一行字：“一遇动摇，立即坚持。”

在磨炼中成长

“黄泛区”，这在过去是一个苦难、贫穷的代名词。1938年6月，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，采取“以水代兵”策略，不顾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，炸开了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，滔滔黄水一泻千里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。豫、皖、苏3省的40多个县、市丧命者近90万人，黄水持续泛滥8年之久，使中原大地饥荒连年，饿殍遍地，人为造成了5.4万多平方公里的“黄泛区”。黄泛区农场位于黄泛区腹地的西华、扶沟两县境内，是1951年1月在原黄泛区复兴局的基础上创建的。万伯翱到农场时，尽管农场已经建场10年了，但当时条件之艰苦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。

到农场后，万伯翱被分到园艺场，与单身的青年工人一起住在一个旧苹果仓库里。房子四面透风，而且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烂苹果的臭味。没有单人床，睡的是大通铺，点的是自制煤油灯。那时，农场还没有用上自来水，用水需要自己一桶一

桶从井里打。万伯翱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打过水，觉得那辘轳和水桶不听使唤，有时几次都打不满一桶水。秋冬的水是冰冷的，常常是一件衣服还未洗净，手已冻僵。面对这陌生的生活方式、生活环境，万伯翱有些害怕，担心自己坚持不住。不过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，他就逐渐适应下来了。因为当地淳朴的农场工人给了他很多温暖。有时他早晨起来晚了，怕误工，顾不上吃早饭，在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工人们就给他带一点玉米面的饼子吃，放点他们自己做的豆瓣酱。他们亲热地叫万伯翱“小万”，因他在兄妹5人中排行老大，也有人叫他“万老大”。

当时，青年工人实习期每月工资仅22元，吃食堂，每天多半是红薯加咸汤，有时也吃些高粱花卷馍。万伯翱当时有两个瓷盆，小盆刷牙吃饭，大盆洗脸洗脚，唯一“奢侈”的物品，是一台日产六极管半导体收音机，这是下乡时廖承志送给万伯

翱的礼物。他时常把它带到田间地头，休息时和大家一起听新闻、听戏曲。万伯翱牢记临行前爸爸的叮嘱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吸烟、不吃零食。穿的衣服全是旧的，衣服烂了，自己学着缝补。平时不打扑克，不下象棋，每天晚上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，在煤油灯下坚持读书，写劳动日记，没有桌子，就趴到床上去写。

万伯翱来到农场不久，就投入到了紧张的“三秋”劳动中。有一次晚饭后，万伯翱正准备去场部看电影，场气象站通知晚上有雨，他立即同大家一起去抢收晒在晒场上刚收获的黄豆。老工人看他身体弱力气小，不让他扛沉甸甸的大麻袋。但是，他还是憋足了劲冒着大雨扛麻袋。等场上的黄豆全部进了库房时，万伯翱已经冻得嘴唇发紫，成了一个“落汤鸡”。由于淋雨受了风寒，当晚他发起了高烧。第二天，烧还未退，万伯翱又随着大家一起出工了。

那一年的初秋，万伯翱经历了一次意

想不到的小小考验。有那么十几天，秋雨连绵，下个不停。一天，他们居住的屋子有一面墙突然“哗”一声倒了，靠着墙放的3张床被砸断。当时，万伯翱睡在屋子另一侧，躲过了这一劫。后来，他在信中向父亲汇报了这件事。父亲回信鼓励道：“房子塌了，你也顶住了，没有动摇，这很好。”

1963年的春节快到了，这是万伯翱下乡之后的第一个春节。快到年底了，农场的大部分工人都在收拾行李，准备回家和亲人团聚。万伯翱也盼望着能够回京与父母一起过年。于是，他试探着给妈妈写了一封信。

1月15日，在离春节仅有10天的时候，万伯翱收到了父亲的亲笔回信和一包书。他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打开了信，父亲那苍劲熟悉的字体一行行跃入眼帘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